

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 与基督教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除学术专著以外，频繁举行的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也形成了大量群体性的学术成果。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论》丛书，意在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论文集中的文章，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目 录

致 谢	1	
前 言	1	
卓新平教授讲话	14	
从近年英文学术著作看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		
现状 / 戴懿华 (Melissa Dale)	1	
宗教、家庭、社会——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以《女铎》、 《女星》、《女青年报》、《妇女》为中心/马长林 杨 红.....		22
从中西史料看清代前期的女性天主教徒/张先清	68	
从吴贻芳个案看个人成长与宗教信仰/吴梓明	105	
被模塑成功的女性角色——明末以后天主教贞女研究/康志杰	126	
天赐姻缘——陕西一天主教村庄的婚姻和社会性别/李雯文	155	
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 中心/赵晓阳		183
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上海基督教 女青年会/李向平 黄海波		210
另一种妇女运动——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农工事业 为例 (1904—1933) /钮圣妮		234
苦难的模式：近代岭东地区女基督徒的传道与证道/胡卫清	283	
1949 年前中国基督教女子神学教育初探/徐以骅	304	
意识投射：19 世纪美国基督新教在华女传教士研究——并以慕拉蒂 (Lottie Moon) 为个案/曲宁宁		322

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

性别、家庭与国家——从教会女子大学看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
融合与冲突/朱 峰 338

“社会福音”与边地女性——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邓 杰 ... 363

女信徒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地位——以福州基督教女信徒
为研究中心（1857—1949）/徐炳三 382

一个女传教士与中国的两个时代——解读白华特医生《在中国的
生活》/陶飞亚 412

致 谢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美国鲁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和上海大学上海市社会学重点学科项目经费的赞助。

中国各地和海外许多学者为本书的论文作出了贡献。除了论文作者外，还有一些学者作为评论人参加会议并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些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段琦、《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徐思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吴小新、美国加尔文大学中国研究计划主任、教授裴士丹（Daniel H. Bays）、北京中国学中心项目主任、教授魏扬波（Jean Paul West）。

上海大学文学院的钮圣妮和黄薇为论文的编辑做了初步的工作。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们的细致耐心的工作，使得本书得以高质量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前 言

基督教史在中国史学中一向处于边缘的地位，除了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外，基督教徒在中国总人口中微小的比例可能也是造成其历史被忽视的因素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变化，2005 年的中国政府白皮书中提到中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口已经达到一亿之众，虽然在总人口中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种现实使得研究者不应该忽视对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研究了。对已经开展起来的基督教史研究，可能也要从基督教的附属事业转向对基督教自身核心问题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基督教与中国人社会生活和精神追求的特殊关系。对中国女基督教徒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基督教自身的核心问题。

不过，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对女性的关注历来非常薄弱。与此对照的是北美学术界对性别和妇女研究日渐增长的兴趣。以 2005 年北美亚洲学会年会的论文为例，涉及妇女的专题讨论包括了丰富的内容，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史中妇女关怀趋势的发展。其实，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女性曾是重要的角色，仅从数量上讲，女传教士和女信徒历来占这个群体中的多数，但在史学著作中，她们的形象与声音几乎完全消失。显然，忽略女性的历史是不全面的历史。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主任吴小新博士和上海大学文学院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及陶飞亚教授等有见于

此，经过多次讨论磋商，决定联合举办一次有关近代妇女与基督教的专题研讨会，主题是探讨基督教宗教组织中的妇女及其社会生活与宗教生活。这一计划得到双方学校的支持，也在学术界引起积极的反响。经过近两年多的筹备，2005年5月28日至29日，“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新校区乐乎新楼召开。30余位中外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17篇。此次会议有几点值得一提：第一，这是国内史学界首次以性别研究与基督教史为主题的研讨会；第二，与会学者中女性占了多数，这在史学会议中是比较少见的；第三，会议采用新的研讨模式：改变了通常由作者本人宣读论文的程序，而由读者先对论文进行解读，再由作者作回应，最后是开放式的讨论。把话语权先交给读者的做法，可能使得读者对自己的评论承担更多责任，作者也更清楚读者的问题和要求，在某种程度上读者和作者都对新文本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1. 文献与资料

文献资料是任何研究的基础。会议将这一内容作为首场讨论的主题。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戴懿华（Melissa Dale）博士的《从近年英文学术著作看妇女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现状》，回顾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有关妇女与基督教的重要英文著作，通过分析西方学者研究主题的变化，梳理了这一领域的走向。文章指出，尽管西方学者研究已经从以西方来华女传教士为中心，转向关注中国基督教妇女，但对后者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不过，近年来一些社会史和外交史的学者开始从性别与权力网络的视角来看中国女基督徒。这些作者不仅使用西文也用中文资料，同时对这一中西相遇中西方妇女与中国妇女两方面的情况都给予关注，这就有利于撰写平衡和全面的研究著作。本文最后对重建妇女与中国基督教史提出一系列有待研究的问题，如中国妇女和女传教士的相遇及这

两类妇女之间的关系、女传教士的社会改革工作的状况和特点，对传教士和妇女信徒的跨学科研究，中西妇女如何互相影响，以及对导致皈依或者未导致皈依的这些文化相遇等等都应引起注意。

近来学界对于报纸杂志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对有基督教背景同时也面向社会的刊物却关注很少，基督教机构出版的专门面向女基督徒的刊物更被忽视。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长林、杨红的《宗教、家庭、社会——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以〈女铎〉、〈女星〉、〈妇女〉为中心》，即以上海档案馆馆藏的几份有代表性的杂志为中心，透析基督教组织对女性基督徒包括其他女性进行的宣教活动。文章分别介绍了面向女基督徒的家庭刊物《女铎》、《女星》，以及女青年会的机关刊物《女青年报》和《妇女》这四种杂志的创办、发行及其内容与社会影响等。由于这几份同类刊物分别定位于知识女性、家庭女性、女青年会员等，因此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表现出的异同，恰好反映出基督教组织用定期的刊物向女性基督徒开展宣教的针对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文章认为刊物在以各种方式宣教的同时实际上既关注女信徒的精神世界也关心到她们的物质生活。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张先清的《从中西史料看清代前期的女性天主教徒》，通过分析中西文献和档案，对清代前期女性天主教徒的信仰和生活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清代前期妇女皈依天主教人数在全国人口比例上微不足道，但在具体的天主教社区中则存在“半边天”现象。这些女性大体包括皇族成员和官宦妻室的上层妇女以及一般下层妇女两大类。文章分析了阻碍中国妇女奉教的社会礼俗因素以及传教士和女信徒通过女传教士传教、设女堂和变通礼仪等方法以求适应中国社会的努力，指出这些变通在清代前期天主教本土化上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文章还探讨了清初妇女信徒普遍存在的圣母崇拜现象及其隐含的文化史意义。不过，作者在回应 Ursula King 提出的性

别研究忽视宗教、宗教研究忽视性别的“双重盲点”的批评时认为，由于女信徒的“三层边缘性”，所以中国妇女与基督教关系的考察在资料上就不是一般的困难，深入研究还有待来日。

2. 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

与中国的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是一个显著特点。本书有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一问题。20世纪初，劳工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基督教女青年会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组织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赵晓阳副研究员的《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女青年会劳工事业的初成和转变，第二部分是女工夜校的艰难历程。女青年会1921年成立劳工部，持续关心反对童工、保护女工等问题，并于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上形成具体工作决议。1928年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将农村妇女和劳工妇女确定为女青年会的两大主体而不仅仅是服务的对象。女青年会强调以教育的方式来开展劳工工作，顺应整个社会提倡平民教育的潮流。女青年会在各地举办劳工夜校，其中以上海女青年会举办的六期最为典型。文章详述了上海女工夜校成立、生存、变化的艰难历程以及工作主题和方式的变化。在近代中国动荡环境下的二十年默默耕耘，使受教育扩大到了普通女性阶层，提高了普通女工的知识能力和社会能力，改变了许多劳动女性的命运和思想。但是面对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在肯定其社会启蒙意义的同时，要看到女青年会事业杯水车薪的局限性。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钮圣妮的《另一种妇女运动——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农工事业为例（1904—1933）》也讨论了女青年会的劳工事业。她认为基督宗教的渊源促成了既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又区别于西方倡导的女权运动的第三种妇女运动——中华基督

教女青年会的妇女运动。这是一种以基督宗教的和平、唯爱为基础，主张温和社会改良的妇女运动。尽管在事实层面上，女青年运动与前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其宗教层面上的意义则是前两者所不具备的。文章以女青年会的农工事业为重点，通过大量事实陈述，分时段对妇女运动进行探讨。她认为基督教精神支持的女青年运动确实对中国妇女的内在解放和社会参与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它的存在充实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内容，但与上文一样，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广大妇女最迫切的是生计问题，女青年运动因其无力解决这样的时代问题而显得“不合时宜”。不过作者认为在中国妇女实现了“外在解放”之后，女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当代妇女工作仍有意义。

上海大学历史系李向平教授及黄海波博士的文章《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女青年会团体性质的根本性变化。女青年会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以后，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从创办初期联谊性质的上层女基督徒的宗教团体，发展成为以世俗社会公益服务为主，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妇女团体。新中国成立以后，女青年会的团体性质被界定为宗教团体，女青年会接受并有意识地进入“宗教团体”的角色。50年代伴随着内部组织机构的调整以及同教会关系的改善，初步实现了向宗教团体的转型。60年代以后，女青年会的服务对象已完全排除了一般社会青年，由于这种服务对象的变化以及各项事工的内部化，最终实现了向宗教团体的转型。作者认为团体性质变化的影响极其深刻：一方面使女青年会活动空间受到限定，另一方面也使女青年会能够在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总体性社会中得以维持其独立存在。

除了女青年会的社会活动，四川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邓杰的《“社会福音”与“边地女性——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则叙述了

抗日战争中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边疆运动”中的妇女事工。这场运动“以促进妇婴健康，改良家庭生活为主要目的”，一方面动员有志边疆服务的妇女参与和从事实际的边疆工作；另一方面是宗教、教育、卫生、生计等服务于边地妇女。文章指出虽然有气候环境恶劣、缺乏妇女布道员等诸多困难，但边疆运动仍在一些地方改变了当地妇女儿童受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的状况，加强了少数民族妇女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

3. 女子教育

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女子圣经和神学教育历来被完全忽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教授的《1949年前中国基督教女子神学教育初探》，根据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对1949年前中国基督教女子圣经和神学教育的发展阶段、基本类型、主要特点及其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初步探讨。本文的解读者段琦教授评价该文所作的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论文结论有两点：一是独立女子圣经神学学校虽较同类男子院校要晚，但发展迅速；二是女子神学教育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有较快的发展，但在神学教育和教会中仍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独立圣经神学女校神学程度低；其二，中国教会不接受女性为教牧人员；其三，女子神学教育在神学研究方面始终薄弱。文章最后提出对中国女传道及女子圣经神学教育作一个准确评估的难点所在，即目前各公会缺乏这方面完整的统计数据，又鲜有个案研究基础。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如女传道的人数是否与中国女信徒的增长有直接关系？女子圣经神学教育的基本神学倾向与长期以来中国基督教会的普遍保守性有何关系？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朱峰副教授的《性别认同与家国传

统：从教会女子大学看近代基督教妇女群体的融合与冲突》也涉及教会女子教育。文章根据两所基督教女子大学——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的档案史料，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构近代基督教女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讨论其在性别认同与家国传统等问题上的融合与冲突。文章通过两校女性群体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在校务争论中体现出相似的女性意识，家庭问题上的共识以及从校务分歧中看到的女传教士与华人女信徒间存在的国家认同差异等问题，最终得出结论：一方面，性别之间的差异建构了女性群体的共同身份，促使女性群体内部的融合，如两校的女性群体性别认同与家庭问题的融合。另一方面，性别内部的差异，又导致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冲突，华南、金陵两校女性群体发生校务分歧与意见冲突，即国家文化认同的差异所致。此文与以往对教会大学研究不同，深入考察了中西女基督教徒群体的内部关系问题，正好填补了戴懿华博士前面提到的研究空白。

4. 女传教士

女传教士研究在西方曾是“中心”，但在中国史学中她们在边缘都没有出现过。本书有两篇文章涉及女传教士问题。

山东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曲宁宁的《移植与重构：19世纪美国基督教新教在华女传教士再研究并以慕拉蒂（Lottie Moon）为例》一文，借用了“纯正妇女意识”（true womanhood）及其衍生出的“妇女性别空间”（woman's sphere）两个概念，以慕拉蒂为个案，揭示此概念如何影响女传教士选择和从事海外传教士事业，并不自觉的将源自本土的性别空间以移植场域的方式重构于她们的海外传教生涯中。文章认为慕拉蒂通过指点中国妇女参与教会活动启迪她们的自我意识觉醒，拓展了中国女性关于社会角色定位的视野，在构建中国妇女的性别空间获得成功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国本土女性性别空间的拓展延伸。

上海大学文学院陶飞亚教授的《一个女传教士与中国的两个时代：解读白华特医生〈在中国的生活〉》，利用英国浸礼会女传教士白华特撰写的《在中国的生活》中记录的中国内战中和文革后两次来华的经历，针对人们通常忽视的女传教士对社会政治的认识以及无意识地强调性别差异的绝对性等倾向，探讨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第一，女传教士是如何观察中国政治的？第二，男女传教士因为性别不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记录究竟有无区别以及到底有哪些区别？文章指出，尽管女传教士具有宗教身份，但由于身处大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其文字中论及政治的篇幅远比宗教多，然而她的政治议论几乎没有理论分析，而只是身边直观的政治。在这一点上，与她同一团体的男传教士并无区别。但和男性传教士不同的，她在社会生活中接触的几乎都是女性，而且对女性尤其是妇女的健康和卫生有更多关注。文章认为在性别研究中，可能要注意到性别的差异确实存在，但不能过度夸大性别的差异，相反要注意分析性别意识凸现和淡出的具体原因，这样研究可能会有更深入的发现。

5. 女基督徒

比起女传教士来说，身份更模糊的是中国女基督徒。本书的论文可能是第一次描述这个群体的形象。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的研究关注的是一个特殊的女基督徒群体。她在《被模塑成功的女性角色——明末以后天主教贞女研究》一文中，对明末以后中国天主教会贞女群体进行研究。贞女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在家中修道或组织成团体，以独身、清贫、服务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她们的虔诚信仰。她们以平信徒的身份或服务于各个教区，或创办婴育堂，虽然所扮演的角色与修女有一定的区别，与新教的女传教士也不同，在传教、慈善、基础教育、服务地方教会等方面参与甚多。文章分两个时段从贞女来源、经济状况、管理与训练情况以及和修女的比较中，全方位地

对贞女体制进行勾勒。作者认为贞女在教会的角色定位以“服务”为宗旨，她们较少考虑自身利益，强调突出“奉献”精神。贞女通过学习、效法圣经中和教会历史上的女性楷模，最终被模塑成“顺服、谦卑、忠心配合事务的角色”。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徐炳三的《女信徒在中国近代中国基督教会中的地位——以近代福州基督教女信徒为研究中心（1857—1949）》一文，考察的是福州基督教女信徒群体，文章首先描绘了晚清时期福州教会中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与实践，作者注意到福州教会较早任用女性作为传道和执事，但是碍于传统的阻力以及社会习俗的惯性，晚清时期福州教会女信徒的地位改变并不彻底。进入民国以后，福州基督教女信徒的地位开始显著的提高。作者从女信徒参与教会事务和管理的情况、待遇情况以及女子教育体系等方面具体阐述了这种观点。作者最后认为女信徒群体在教会中实力的增长是其地位提高的决定性力量。

以往的研究一般都肯定了教会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引导作用，教会确实在提倡男女平等，推进天足运动，反对一夫多妻和溺杀女婴等方面确实做出了贡献。然而是否由此可以推论，教会能够运用同样的思想主导教会体制内部的行为，从而使得教会内的妇女获得相应的甚至是更大程度的“解放”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卫清教授的《苦难的模式：近代岭东地区女基督徒的传道与证道》运用非常详尽的史料，考察近代岭东地区基督教妇女活动。作者发现女基督徒的人数逐步从少数变为多数乃至大多数，妇女传道者在基督教的传播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这些却并没有改变教会以男性为主的基本格局。在档案文献中女性基督徒群体普遍存在“隐身”和“失语”现象，无论在保存完整的教会档案资料、教会的正式会议文献、官方记录的教会人物传记，还是专门的女宣道会档案中都难以找

到有关女信徒的系统资料，女性基督徒在教会史上只存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在教会体制内部没有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妇女在教会权利体制中仍然处于极不平等的边缘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女基督徒对于自身苦难的叙说则是一种现代性的话语模式和宗教皈依的策略。尤为重要的是，女基督徒自身对于教会体制内部的不平等并无异议，她们安于这种角色，两性的不平等被一种貌似神圣的教会内部社会性别分工所悄然化解。文章最后认为女性基督徒的苦难不仅在于她们所面临的生活与灵性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尚不充分拥有自己定义这些苦难的权力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女基督徒在教会中的平等只有相对的意义。

6. 跨学科研究

性别与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领域。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吴梓明教授的《从吴贻芳个案看个人成长与宗教信仰》，运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艾力逊（Eric Erikson）提出的“人生成长八阶”的理论，将之应用于检视基督教信仰在吴贻芳一生的工作与她面临和处理几件大事时所起的作用。文章首先明确吴贻芳的基督徒身份，并列出了包括担任教会大学校长、出席签署联合国宪章在内的五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随后又列出至 1941 年为止发生在她身上的六次重要的人生经历。吴教授用艾力逊理论分析的结果，发现基督教不仅是“导人倾向于善的唯一动机（生命原动力）”，也同样是塑造吴贻芳整个生命的原动力；它不单帮助吴贻芳朝向正面发展成长，确立其人生理想和方向，更让她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工作中活现出她所具有的“创建”和“厚生”生命来。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李雯文的《天赐姻缘——陕西一天主教村庄的婚姻和社会性别》则是以人类学的方法，以九个月的田野调查为基本资料，通过对陕西一天主教村庄中围绕婚姻这一社会行为的变

迁和现状，研究天主教对中国农村婚姻和社会性别的影响和作用。天主教对村民的婚姻形态和观念的渗透，使得天主教家庭间的联姻作为保存信仰的一个前提支配着村民的择偶。然而也应看到宗教仅仅是影响村民生活的众多权威中的一个，父权制解体后，年轻的一代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追求感情，夫妇之爱以及个人的空间和隐私等。在家族观念仍然强烈，风气相对保守的陕西农村，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大多仍会遵守父母之命回乡择偶，但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掌握了决定权。以往对待嫁入村子的媳妇和嫁出去的女儿的宗教背景有不同的标准，如今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宗教信仰逐渐失去了以往的优先地位。村民的信仰深受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姻缘在他们的眼中既是天定也靠人为。在古老的传统和时代的潮流中，今天的解庄村民不断寻找着新的平衡点。

收于本集的个案研究事实上仅是关于女基督徒初步的探索，但它们帮助我们对妇女与中国基督教的三个主题有一个最初的认识。

1. 基督教信仰与女信徒的生活

基督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区宗教输入中国，在两个方面影响了部分妇女生活。一是这种新的信仰指引了她们的精神生活，使她们的精神追求得到某种满足，二是这种信仰组织成为她们得以参加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机制，这在传统的佛教和道教中都不曾有过的。也许可以谨慎地指出，基督教是最早的存在至今的合法的中国妇女集体生活的组织。也许更重要的，对她们的现实生活，基督教的道德教诲及来世追求，都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成为她们得以超脱尘世苦难的寄托和奋力公益事业的动力。不少女信徒身份的知识分子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无论从唯物主义世界观角度如何看待这种行为逻辑，对中国历史来说，这种基督教信仰下行动的因果关系，确实增加了值得深思的新内容。

2. 文化交流

基督教还促进了中西妇女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女信徒来说，基督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最早的妇女接受现代教育的通道。各种女校的创办，也使部分中国女子第一次有了机会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并且与男性同学一样，因教育进入社会流动，成为为数不多的女性基督教精英。与教育同样的是，女信徒还是中国女性中最早摆脱缠足、反对买卖婚姻的群体，反对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种种陋习。虽然这个群体很小，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但就像梁启超早年就指出的那样，教会女校开风气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中国女信徒来说，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是她们反思封建文化弊病的开始。对女传教士来说，也提供了使她们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扩张了她们观察本国文化的视野。

3. 社会改良

中西女信徒群体从事社会改良活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女青年会延续其在西方活动的传统，把社会改良的一套搬到了中国，在资源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点点滴滴的工作，虽然对广大中国社会来说，这种努力微不足道，但历史学则不因其小而忽视这种努力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无效，才使许多女青年会精英最后选择了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道路。因为这两者之间在当年的女青年会的一些组织者来看，有某种相同之处。

不过，对妇女基督徒的研究在中国毕竟刚刚起步，正如会议论文反映出来的，至少在下列三个方面进行了努力。第一，个人与群体的研究。女传教士和女信徒的个人研究是女基督徒历史的基础，女传教士个人的研究，西文著作中有不少这样的研究，但在多年前顾长声出版传教士人物传中女传教士一个也没有，显然这方面应该深入下去。早期中国女信徒的研究在资料上比较困难，但在 20 世纪之后特别是